

中国传统文化新编

主编 王玉德 邓儒伯 姚伟钧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人文素质教育教材系列

中国传统文化新编

主编

王玉德

邓儒伯 姚伟钧

副主编

康志杰

雷学华 何宗旺

图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第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新编/王玉德、邓儒伯、姚伟钧主编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 9 月

ISBN 7-5609-1368-7

I. 中…

II. ①王… ②邓… ③姚

III. 传统文化—中国—理论

IV. G04

中国传统文化新编

王玉德 邓儒伯 姚伟钧 主编

责任编辑：余东升 李晓明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照排社照排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插页：2 字数：278 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609-1368-7/G · 133

定价：8.8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收了近年来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全面而又十分精练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体例编排新颖独到，有助于读者系统地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本书既可以作为各类高等院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综论	(1)
一、文化概说.....	(1)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	(3)
三、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6)
四、中华民族的重德和宽容精神	(13)
五、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17)
六、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	(22)
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26)
八、中国古代科技概说	(32)
九、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气象方面的成就	(34)
十、中国古代的地学成就	(37)
十一、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39)
十二、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	(42)
十三、中国古代的农学成就	(44)
十四、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	(46)
十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51)
第二章 断代文化	(59)
一、中华文化的源头——原始文化	(59)
二、青铜时代——夏商文化	(63)
三、从神本走向人本——西周文化	(67)
四、革新新时代——春秋战国文化	(70)
五、大一统文化的开端——秦汉文化	(76)
六、分裂与融汇的交响曲——魏晋南北朝文化	(82)

七、走向辉煌——隋唐文化	(87)
八、精密深邃——两宋文化	(93)
九、包容万千——辽夏金元文化	(100)
十、方死与方生的格局——明清文化	(106)
第三章 区域文化	(114)
一、中原文化	(115)
二、楚文化	(121)
三、齐鲁文化	(126)
四、关中文化	(133)
五、吴越文化	(138)
六、西北文化	(144)
七、滇黔文化	(148)
八、三晋文化	(153)
九、东北文化	(160)
十、岭南文化	(166)
十一、巴蜀文化	(172)
第四章 专题文化	(182)
一、诸子文化	(182)
二、法家文化	(188)
三、儒家文化	(192)
四、新儒家	(197)
五、道教文化	(202)
六、佛教文化	(208)
七、理学文化	(211)
八、科举文化	(215)
九、书院文化	(219)
十、宗法文化	(223)
十一、法律文化	(227)
十二、礼仪文化	(229)

十三、军事文化	(236)
十四、谋略文化	(241)
十五、神秘文化	(245)
十六、鬼神文化	(256)
十七、巫术文化	(260)
十八、图腾文化	(263)
十九、姓氏名号文化	(267)
二十、数字文化	(278)
二十一、绘画文化	(282)
二十二、书法文化	(287)
二十三、节日文化	(293)
二十四、服饰文化	(298)
二十五、饮食文化	(302)
二十六、住宅文化	(307)
二十七、武术文化	(312)
二十八、养生文化	(316)
二十九、生态文化	(320)
三十、城市文化	(322)
三十一、园林文化	(326)
三十二、工商文化	(332)
三十三、家政文化	(336)
三十四、史学文化	(341)
后记	(347)

第一章 综论

伟大的民族必然有伟大的文化，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以伟阔宏大、精深神奇的文化著称于世。作为炎黄子孙，每个人都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作为人类一分子，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然而，他们对中华文化也只有朦胧的印象。

中华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殿堂，任何人以毕生精力都不可能穷尽其底蕴。然而，我们应当尽量了解中华文化的大略和研究进展。本章侧重介绍中华文化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值得弘扬的内容。

一、文化概说

人类社会有个奇异的现象，最简单的东西是最复杂的东西，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东西。“文化”一词亦如此，我们身边无时无处没有文化，但谁都很难说清楚什么是文化。迄今，学者们冥思苦想，提出了两百多个定义，仍然莫衷一是。

“文化”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易传·贲卦象传》就说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含义是以文治教化民众，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到了汉代，“文化”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刘向《说苑》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汉代以后，“文化”成为常用词，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化的概念不外乎文治教化，强调用经典、礼制、道德等教化世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意为人为努力摆脱自然。中世纪，文化概念的含义被神学观念所压倒。到了 19 世纪，文化才作为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德国学者 S. 普芬多夫（1632～1694 年）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从 19 世纪开始，文化的概念成为讨论的热点。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 年）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① 这个定义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迄今为止，围绕文化概念形成了诸多派别，如文化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论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地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符号文化学派。他们有的把文化作为包罗万象的整体，有的把文化作为社会传统，有的把文化作为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有的把文化作为人调适于环境的过程，有的把文化作为价值系统。

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② 但是，学者们又认为：文化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精神产品的各种知识，其本质是传播，它是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

由于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拓展和深化，原有学科分类已经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人们寻求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方法，寻求新的研究范围，于是，文化学成了热点。

文化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文化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②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社会学、文化经济学、文化传播学、文化心理学、民族文化学、军事文化学、区域文化学、应用文化学、神秘文化学等。

文化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诸如文化模式、文化功能、文化观念、文化融合、文化变革、文化调适、文化背景、文化圈层、文化历史、文化哲学等。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处于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有较大影响。中华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闪烁的精粹，也有糟粕。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逐渐落伍，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和振兴。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的特点、规律、贡献等课题正在进行研究，可以断言，中华文化必将弘扬光大。（王玉德）

参考资料：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二、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社会因素作用下，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相比，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顽强的再生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老的农业民族之一。中国的文明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东亚文明区的主体。中国文化历尽沧桑，始终传承不绝，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断的古老文化。世界中其他古国的文化，在发展历程中都曾出现过断层，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序列有如此完整、连续的形态，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例。

第二，“大一统”与多元文化两种倾向并存。自秦代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体，历经两千多年，统一是其主流，这

在世界中世纪史是仅见的一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素质、人才条件诸方面的种种“大一统”的先决因素，都是其他国家中世纪所不可能具备的，也是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文化多元倾向，按地域出现不同的学派，给文化增添了活力。

第三，入世思想成为主导心理，避免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殷商时期宗教意识一度占据统治地位，但没有系统的宗教。周代开始“重民轻神”，虽然也信奉“天”，但天命论最终归结于人伦说。秦汉以后，宗教在中国有所发展，但老百姓并不专一，而帝王总是高居于宗教界之上，政教分离，政在教上，较少有人成为纯粹的宗教徒。唐宋以来，士人援佛入儒，但理学与佛学的界限分明。

第四，以伦理道德学说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本，道德的威力始终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形成了“德治主义”。儒家伦理思想渗透于全民族的心理、意识之中，孔子的仁学成为宗法思想与封建国家观念之间的中介，“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成为道德条目。其后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利用思辨去满足伦理的需要，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忽视功利，虐杀了人文精神，使社会呈现僵化而有秩序的状态。从另一方面说，伦理思想在一定条件下鼓舞人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造就了许多悲壮的民族英雄。

第五，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中国文化又具有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性”。先秦诸子学派的共同主题和基本内容是政治。历代统治者促使中国古文化沿着封建政治化的轨道滑行。文化的各个侧面都依附于政治，使政治学说发达。但是，政治型文化缺乏自由空气，不重视科学技术。政治功利主义使科技没有独立地位。先秦的墨家曾经以科学探求精神活跃于一时，但秦汉以后就消亡了。历代的科学思想和著作不受重视，“学而优则仕”，人

们热衷于政治功名。

第六，朴素的整体观念，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作为“科学型”的欧洲文化的理论基础，欧洲哲学较多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斗争。作为“伦理型”的中国文化理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则比较趋于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中国古代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老子表述的“有与无”、“阴与阳”思想包含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制约的系统思想，北宋的太极图描述了世界构成与发展的模式。但是，中国古代素朴的整体观念缺乏对各个细节的认识能力。中国的思维方式发展史缺乏一个机械唯物论阶段，这与近代工业及相关的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不发达是互为因果的。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由地理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型伦理文化，其他的文化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即使是“自强不息”“舍生取义”等优秀的民族精神也是从属于政治型伦理。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因此，中国文化注重人事，注重治国，注重驭民，注重伦常。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重要的统治工具。传统文化在观念上至少有三个特质，即群体观念、向心观念、中庸观念。群体观念包括“和”与“公”两个概念，向心观念包括“忠”与“孝”两个观念。

认识中国文化的特征，目的在于发挥我们的巨大潜力，抛弃惰力，博采外来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再次大放异彩。（王玉德）

参考资料：冯天瑜：《中国文化的特征》，载《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徐大同、高建：《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吾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背景》，《学术月刊》1987年第5期。

三、中国文化史的分期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里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它是汉民族文化融合、摄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结果。在它数千年的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也经历了诸多的变革和创新，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多变革和创新中，汇集成一条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长河。从中国文化的演变看，可将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分为九个时期，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明末清初、近代、现代、当代。从这九个时期，可以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

先秦时期，从夏朝立国到战国，这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开始，这个时期，国家林立、诸侯异政。据传“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①各国在文学、习俗、仪礼上都有差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出现了中国文化的空前灿烂。孔子、孟子的儒家，老子、庄子的道家，墨翟的墨家，商鞅、韩非的法家，邹衍的阴阳家，公孙龙的名家，张仪、苏秦的纵横家，许行的农家，孙武、孙膑的兵家，各家各派，著书游说，相互驳难，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自此以后，诸子的学术思想，师承流变，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秦汉时期，包括秦朝和两汉，是中国文化发展第二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统一。中原华夏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即汉文化或本土文化。在统一的地域内，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特别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从此确立了儒家在封建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

① 吕氏春秋·用民·卷十九

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儒家经典成为自此以后封建社会的学术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期。这个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一元化的破碎，从此文化也走向多元化。首先是印度佛教的东来。早在东汉前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便迅速地传播开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逐渐融合。其次是道教的流行。道教创立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极为盛行，并由原始的民间宗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方向演变发展，出现了像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著名的道教人物。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变化则是玄学昌盛。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的动乱，经学的失落，名教的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于是，人们注意力转向老庄哲学，产生了以《易》、《老子》、《庄子》为经典，崇尚老庄自然无为，反对传统经学束缚的玄学思潮。何晏、王弼、裴徽、欧阳建、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是玄学的主要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蔚然，名家迭出，玄学思想影响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此时代文化的主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期。这个时期，由于割据纷乱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加之圣君贤政之作用，迎来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大发展。不过，此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佛教的创造和繁荣。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已融入中国固有文化之中，创造了中国式的佛教理论思想——禅宗。禅宗有“南禅”、“北禅”之分。唐五代以后，以南禅为主流的禅宗进入成熟期。禅宗是融佛教与中国文化为一体而产生的中国化佛教学派，也是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的佛教流派。隋唐时期佛教的繁荣还表现为佛教学派的林立。当时，除禅宗外，还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维识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七大宗派。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另外，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不只表现在佛教的繁荣一方面，

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样开创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如文学中的诗，其作者之多，数量之庞大，水平之高，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又如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隋唐时代是十分活跃的。繁忙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交流。朝鲜、日本的遣唐使和佛僧的东渡，使唐朝文化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玄奘的“西天取经”，促进了中国佛教的繁荣和发展。

宋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五期。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发出一种思想文化——理学。理学包括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理学派和心学派尽管名称不一样，实际上意义相同，“心，即理也”。在理学家看来，“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天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宇宙最高本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①理学家在提出“理”的同时，把不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人欲”摆在“理”的对立面予以批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戕害人性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的根本宗旨，他们提出“理”、“气”、“心”等哲学概念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哲学上阐述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对性，为封建统治服务。理学自二程、朱熹创立以来，在宋朝一直占有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典型的官方哲学。元朝时，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科举取士的法定课本。明朝初把理学著作编纂成几大册经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明太祖在诏书中曾明令：“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经正为尚。今后务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课令生员，诵习讲解。”理学成为当时的文化主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① 朱子语类·卷一

明末清初时期，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六期。这个时期有两个较明显文化现象：一是西方文化开始输入；二是朴学的兴起。明朝末年，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尽管在以后曾多次受到中国统治者的压制，但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着。这些传教士在带来西方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文化上的空白，如利玛窦与明代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同文指算》、《测量法义》等书，汤若望译著了《浑天仪说》，南怀仁译著《仪象法》等，白晋、张诚译著了《实用几何学》。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涉及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军事等。同时，基督教另外两大派别东正教和新教在康熙后也陆续传入中国。至此，西方文化开始在中国建立了根基。此后，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学校，兴建医院，出版报刊，译著书籍，从文化上逐步冲击中国的文化。但是，在鸦片战争前，这种冲击并不明显。明末清初，在西方文化开始冲击中国文化的同时，在中国的文化界，由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强压，便形成一种考据的朴学之风。许多学者在考据文字，训诂经典，整理旧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不仅出现了像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阎若璩、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章学诚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国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们一反宋明理学一味追求“义理”的虚浮之风，提出了“经世致用”朴学思想，力图从文献的整理研究中探索出经世之策。尽管乾嘉时期的朴学偏离了前期的这一治学精神，把目标投向了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金石、乐律和典章制度等领域，但其成就却是突出的。其涉猎面之广（包括史学、经学、方志学、地理学、历算学等），著作之多，历时之长，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朴学是当时文化的主流。

近代时期，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至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七期。这个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炮舰的威凌，西方文化的全面传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致使中国近代

文化发生了质变、突变。在鸦战前夕，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此，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林则徐等人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连续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加之国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始，在中国兴起一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除兴办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外，洋务派还在各地开办了新式学堂，在课程设置上类同西方，如代数、几何、三角、化学、天文、外语等，同时还开设外国的历史、地理，初步具备了近代学校的特点。不过，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报刊的发行和西方书籍的翻译及出版。报刊方面，除教会和外商的外，有伍廷芳创办的《中外新报》，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数十种。在外国书籍的翻译及介绍方面，要数严复功劳最著。严复的译著很多，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涉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等。除严复外，还有梁启超、王国维、杨廷栋等。通过报刊的发行和译著的出版，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大量输入中国，严重地冲击着中国固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除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外，同时在政治界、文化界就中西文化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洋务派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点，主张在保存中国主体文化不变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政治、经济体制不变条件下的科学技术的采用。顽固派是典型的传统主义者，主张“华夷之辨”和“道器之辨”，不能接受西方夷狄文化。其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关于西学的争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制